

组织变迁中的 意识形态整合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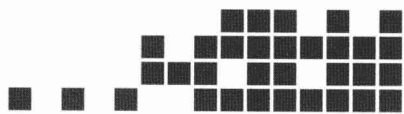
吴海琳●著

The Research on Ideology Integration in Process of Organization Change

- 问题的缘起与研究框架
- 意识形态的理论流变与社会学的视角
- 西方社会学视角下的意识形态研究及其启示——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到建构主义
- 意识形态的现代转向与组织论视角
- 制度变迁下的组织意识形态分化
- 组织意识形态整合实践——三个案例分析

ZZBO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大学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文库作品受吉林大学 985 工程项目资助

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1CSH050)

项目:吉林大学杰出青年项目(2011QG002)的阶段性成果

组织变迁中的 意识形态整合研究

吴海琳●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组织变迁中的意识形态整合研究 / 吴海琳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7

ISBN 978-7-206-08055-5

I. ①组…

II. ①吴…

III. ①社会变迁—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44721号

组织变迁中的意识形态整合研究

著 者:吴海琳

责任编辑:刘思佳 封面设计:孙浩瀚

制 作: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长春市显达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7 字 数:21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8055-5

版 次:2011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吴海琳，1978年4月出生，吉林长春人，1997年至2004年先后在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获得法学学士和法学硕士学位，2009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主要研究领域为组织社会学与文化社会学，已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吉林大学杰出青年基金项目1项；参与国家级重点与一般研究项目4项。

序

改革开放以来，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对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虽然社会结构转型一定包含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尤其30多年来的发展市场经济、改革国有企业和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实施，无一不是以思想解放或意识形态创新为前提的，但中国社会学却没有对社会转型中的意识形态变迁给予足够的重视，同制度变迁、利益分化、阶层重构、资源重组、权力转移和贫困人口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相比，意识形态研究显得十分微弱，由此而形成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研究中一个十分明显的薄弱环节。

反观社会学史可以发现，无论西方社会学还是中国社会学，都有很多社会学家对意识形态问题开展了深入研究。在西方社会学中，孔德把实证社会学的建立看成是人类精神史上的一场革命，主张用新思维方式、新价值理想和新道德观念来引领社会发生新变化；迪尔凯姆把社会学规定为关于制度的科学，而他讲的制度不仅是法律法规，而且更重要

的是指在更广泛层面上规定人们行为的集体表象、道德规范和宗教意识等；马克斯·韦伯认为社会学要研究由主观意愿支配的社会行动，因此他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做出了充分论述。可见，西方古典社会学家都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研究。至于当代西方社会学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就更是异常丰富。福柯关于知识权力，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理性，布迪厄关于实践感和文化资本，吉登斯关于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福山关于价值观念大分裂、卡斯特关于认同的力量，凡此种种，都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开展的当代人类社会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

在中国社会学史中，特别是在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学形成之际，康有为、严复和梁启超等人，从对晚清今文经学的继承，对西方社会学的引入，以及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中展开了中国社会学的发端。康有为把关于社会制度、社会行动和社会结构的思考，都融入其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之中，对社会生活开展的丰富研究，目的都在于支持其社会改良主义政治理想的实现。严复译介和引入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社会学，其目的同康有为是相同的，也是以促进政治改革、实现强国保种的价值理想为目的的。而梁启超以群术治群的群学理论、探究群体进化的新史学、过渡时代的民族国家理论、化育新民的社会重建理论等，这些别开生面的社会学理论，用辩证批判、历史进化和意义阐释等新原则新方法，表达了明确的政治理想和价值追求。因此，康有为、严复和梁启超等中国社会学先驱，他们一直把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同意识形态问题紧密联系起来思考，形成了具有鲜明价值追求且占有学术中心地位的早期中国社会学理论。

根据中外社会学的历史事实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回避意识形态研究

仅仅是特殊条件下或较短时段内的学术现象。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回避意识形态研究，与中国社会学遭遇了20多年的“左倾政治禁闭”有关。中国社会学在20世纪50年代被撤销，甚至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一批社会学家被打成右派，这些都是在极左的政治意识形态控制下造成的政治灾难。经过20多年禁闭的中国社会学，在这场灾难中不仅留下了难以抚平的严重创伤，而且也形成了难以忘却的深刻记忆。对灾难的记忆难免有消极的阴影，遭遇极左政治意识形态沉重打击的中国社会学，即使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也难以排除对政治意识形态打击的恐惧。于是，把社会学建成远离意识形态的科学，很快成为社会学界广得人心的共识。

然而，事与愿违，即便中国社会学能在意愿上坚持回避意识形态问题，但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却无法躲避意识形态问题的纠缠。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引起了中国社会空前复杂的变化，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革，而其最复杂、最深的变化莫过于人们的思想观念或价值信念的变化，也就是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中国社会学积极研究社会生活各种层面的变化，但对意识形态的变化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政治相对稳定，文化繁荣，社会建设也有了较大发展。然而，在取得了这些举世瞩目成就的新形势下，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建设任务依然十分艰巨。这不仅因为30多年来中国主要注意力集中于经济建设，而思想观念或意识形态建设的投入相对薄弱，而且还在于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强大推动下，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动，人们的利益关系、

身份地位、社会环境等都发生了复杂变化，这些变化必然要影响人们价值信念的变化，社会意识形态也必然随之发生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意识形态变迁最明显的一点是，原来整齐划一的“阶级意识形态”发生了分化，具体表现为人们的价值信念、理想追求、政治意识和道德观念等都发生了复杂分化。而在“阶级意识形态”出现明显分化的同时，群体意识形态和组织意识形态却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发展起来。虽然近年中国社会学界也发表了一些关于社会团体、企业组织、利益群体、宗教团体的价值认同、思想理念、理想信念等方面的研究，但是很少有人将之上升到群体或组织意识形态层面来把握，群体或组织意识形态研究成为当前组织研究热潮中的一大冷点。

吴海琳博士的学术专著《组织变迁中的意识形态整合研究》，对社会学传统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作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考察，总结了社会学各种流派关于意识形态研究的基本观点、方法原则、理论创新、思想逻辑和演化趋势，概括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组织意识形态的生成、分化与整合，特别是根据实地调查研究，在丰富的经验事实基础上分析了组织意识形态分化与整合的表现形式、发展过程与运行机制。虽然这本著作提出的一些问题和论述的观点还有进一步探索和深入的空间，但仍不失为近年中国社会学界少见的关于意识形态研究的一部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学术专著，有助于推进中国社会学更深入地研究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发展变迁。

刘少杰

2011年7月2日于北京世纪城时雨园

目 录

导言	001
第一章 问题的缘起与研究框架	005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005
第二节 核心概念：组织、制度与意识形态	007
第三节 研究框架	013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案例的选取	017
第五节 研究意义	019
第二章 意识形态的理论流变与社会学的视角	022
第一节 意识形态概念的形成和理论演变	023

一、特拉西与观念学——意识形态概念的产生	023
二、拿破仑对意识形态的贬义性阐述——从科学到空想	025
三、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两种不同的维度	026
四、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分析的扩展	031
五、从意识形态到知识社会学	036
六、意识形态的终结与无法终结的意识形态	039
第二节 学科分化与意识形态观的分化与整合	
——“标准”的宣战与融合	044
一、政治学与意识形态的“斗争”史	044
二、经济学以“效率”为意识形态立法	045
三、学科分化下社会学的重新整合	047
第三节 社会学的研究范式与意识形态概念的界定	050
一、社会学的研究范式	050
二、社会学视角下的意识形态概念界定	054
第四节 我国的意识形态研究现状	057
小结	060
第三章 西方社会学视角下的意识形态研究及其启示	
——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到建构主义	062
第一节 作为社会事实的意识形态——从实证主义到结构主义	063

一、涂尔干的意识形态研究——实证主义的典范	064
二、马克思与帕森斯——结构主义范式的延续与发展	072
第二节 作为价值理性的意识形态	
——从人文主义到解构主义	074
一、韦伯的意识形态研究——人文主义的开启	075
二、解构主义的迷狂与意识形态的另类存在	080
第三节 作为文化与认知图式的意识形态	
——从知识社会学到建构主义	083
一、知识社会学视角下现实的社会建构	084
二、转向生活世界的意识形态研究——建构主义的实践论	088
小结	101
第四章 意识形态的现代转向与组织论视角	103
第一节 意识形态的现代转向	104
一、意识形态观的现代转向	
——从革命论、批判论、终结论到建构论	105
二、意识形态功能的现代转向	
——从政治维护导向、经济促进导向到文化建构导向	107
三、意识形态主体的动态演化——从抽象到具体	110
四、当代文化影视化与意识形态传播手段和	

表现形式的感性化	114
第二节 社会生活的组织化与意识形态研究的组织论视角	116
一、从阶级性到组织性——意识形态研究的组织论视角	117
二、效率与合法性——组织的双重追求	125
三、知识社会学、文化社会学视角下的组织意义建构	132
第三节 组织意识形态的建构性与嵌入性	138
一、组织意识形态的建构性——组织的意义框定	138
二、组织意识形态的“嵌入性”：文化、制度与心理	142
小结	147
 第五章 制度变迁下的组织意识形态分化	 149
第一节 国有企业的原生性与代表性	150
第二节 计划经济的组织意识形态： 国企同构的政治本位意识形态	 153
一、组织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关系	153
二、国有企业与国家的特殊关系	156
三、组织间关系的单一与封闭	163
第三节 市场经济时代的组织意识形态： 国企分离的自主建构	 166
一、国家意识形态的变迁：	

组织赖以生存的制度文化环境的改变	166
二、企业同国家关系的巨变	170
三、组织间关系的多元化	175
四、从外部学习到内部治理的制度创新	178
小结	182
 第六章 组织意识形态整合实践——三个案例分析	185
第一节 组织意识形态整合路径	186
第二节 内部整合为主	
——部落式组织的意识形态整合	191
一、生命安全保障意识形态的形成	192
二、组织意识形态的传播、制度化与内化	
——感性文化仪式与标记体系	197
三、组织意识形态整合下的认知与认同	203
第三节 外部适应为主	
——协变式组织的意识形态整合	206
一、树立健康市场意识的组织意识形态整合	209
二、市场意识的传播与内化:	
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多元传播媒介	213
三、制度化机构设置与自主学习机制	216

第四节 层级式文化建设

——集团公司组织的意识形态整合	218
一、组织意识形态的具象化	219
二、组织意识形态系统化——兼容内外的五大文化建设 ..	224
三、企业文化传播网络建设——高覆盖与高投入	231
小结	235
结语	238
参考文献	242
致谢	258

导 言

中国社会改革的独特性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所导致单位社会的终结和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变，更是吸引了众多社会学家的兴趣，一时间关于组织与制度变迁的研究如潮涌现。组织客观制度变迁的背后必然伴随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的变化，而秩序的达成又依赖于人们的主观认同，关注制度与组织变迁的社会过程不仅仅包括客观可见的人口、规章、生产工具、技术等方面的变迁，还有树立其上主观意愿发生联系的集体意识——意识形态的变化，我们不应该只去关注那些可见的社会结构和行为，更应该去深入考察沉淀在人们心中的意义结构及其作用机制。因此，组织意识形态整合实践在中国单位组织变迁的历史场景下成为有意义的社会学研究议题。

其实，意识形态研究近年来早已引起多个学科的广泛关注，如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强调意识形态与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的关系；政治学对意识形态与权力的一贯关注；组织社会学中的制度学派对支撑组织合法性的共享观念的强调。在对意识形态的理论梳理中我们发现意识形态是一个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发生流变的概念，意识形态的功能与价值在不同学科视角下被予以不同定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从意识形态的

阶级分析转向组织论分析，并在中国制度变迁的场景下，以社会学的视角对组织变迁中的意识形态整合实践展开具体过程分析是本研究的旨趣。通过研究有以下发现：

其一，意识形态的社会学分析具有独特性和重要意义：社会学视角下的意识形态研究超越了哲学认识论层面对意识形态与真理关系的二元对立范畴，以及政治学范式下对意识形态政治功能的片面强调，认为意识形态是维护阶级利益和阶级统治的思想武器。社会学视角下的意识形态研究更关注对各种具体的意识形态得以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功能发挥的社会基础以及实践后果进行实证分析，更适合价值多元社会的意识形态研究。同时，意识形态的社会学分析也将弥补现有研究中宏观功能分析居多，而对意识形态演进过程和作用机制微观考察略显不足的缺欠。

其二，意识形态的现代转向、社会生活的组织化和组织研究视角的行动转向三者共同激发了意识形态研究的组织论视角。在当今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的主体、作用机制及其表达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当下生活中，社会组织和有组织的利益群体比民族与阶级更为具体化，正成为意识形态的新主体，意识形态主体的具体化必然带来意识形态表现形式和传播手段的多样化，当代文化的影视化更是加剧了这一进程，使意识形态的传播手段和表现形式呈现出更强的感性化特征。社会生活的组织化在现实层面为意识形态研究展开了组织论视角，基于异质多元的组织意识形态整合不同于基于同质一元的阶级意识形态整合方式，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意识形态的组织论分析视角成为阶级分析视角的有益补充而发挥重要作用。同时，组织本身对有别于效率机制的合法性机制的依赖，也使组织意识形态成为组织适应外部环境与实现内部整合的重要力量，它作为组织的表意性支撑使组织结构和日常实践得以不断的被再生产。组织研究视角的行动转向则使人们去关注作为行动系统而非结构系

统的组织，探讨组织的行动力是由何种价值观念驱动的，意识形态指导下的组织意义建构与整合实践成为组织研究新的制高点。

其三，制度变迁与意识形态的动态演化存在某种共生关系。无论是人为设计还是自发演化的制度，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是人与人互动的产物，都伴随着人们对意义的理解与价值选择的主观过程，并且，只有建立在人们对制度的共同理解与认同基础上，制度对行为的约束关系才能达成，制度的作用才可能是长期有效的。因此，制度不仅仅具有客观性，制度应该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并且制度的主观维度是制度的深层结构，是制度得以被理解和实施的基础。制度变迁不是单纯的客观过程，我们实际拥有和向往的价值理念直接决定我们在什么样的意义范畴内进行怎样的制度选择，不同的意识形态决定了制度的初始路径，在制度确立后，决定制度选择的价值理念就渗透到制度的深层理念结构中，成为指导制度实践的价值原则，意识形态的功能就由制度选择机制发展为对制度本身的意义阐述机制，是促使制度与行动相互联结的意义桥梁。因此，当制度变迁发生时，不仅仅是作为制度表层结构的各种具体规章条文发生变化，更有作为制度深层结构的价值逻辑转换蕴藏其中。在现实的考察中我们就发现了中国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与企业组织意识形态分化的伴生现象。作为变革最为深刻的组织形态，国有企业制度变迁背后伴随着国有企业组织意识形态的深刻变化。国家、市场和其他组织是对企业意识形态分化产生重要影响的三个因素，三者力量的交互作用共同框定了企业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定位，原有国家一元控制下形成的国-企同构组织意识形态格局正在多元交互力量的冲击下发生分化。

最后，通过个案考察，对丰富多样的组织意识形态整合实践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从企业单位组织的抽离，使企业组织拥有了相对自主的意识形态建构空间。组织通过意识形态建设，借助制度化和符码化等手段塑造组织成员对组织和自我角色定位的想象与理